



## 暖男建平兄

□潘鸣

建平兄离开在一个春风和煦的日子。

他临走那一刻，至爱亲朋和德阳市作协众多同仁聚守在床榻边。听着一声声不舍的呼唤，建平最后努力睁开双眸，从喉咙里挤出含糊的两个字：“谢——谢——”。生命的大限跨越，没有惊涛骇浪，电闪雷鸣。静谧之中，一盏油尽的灯，火苗轻轻一跳，倏然熄灭。我噙着泪，走到客厅窗台边。楼下滨湖路，生活之流穿梭如常，碧波荡漾的旌湖上，水鸟依然在飞翔鸣啼……

三十多岁时与建平兄相识，其时，他在德阳市文化馆当文学创作辅导员。风华正茂的建平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常常骑着自行车往基层跑，与区县宣传文化部门和众多文友交情甚笃。那时，他的文学创作正值高峰，陆续有若干中短篇小说在《中国作家》《四川文学》《青年作家》《红岩》等刊物发表，在省内文学界已颇有知名度。但他却从不以此自傲。与人见面，一双温暖的大手主动伸过来；谈话交流，无论面对谁，始终面带微笑，彬彬有礼。下基层辅导业余作者很辛苦，我要宴请他，他说街边小店安逸。于是就去大排档，三两个炒菜，再加盘花生米下酒。酒也是坛子泡酒，很廉价。建平不愧是山西吕梁汉子，半斤八两不在话下。但喝得再多，终不失那份温文尔雅，谈正事绝不含糊。

建平生性热情仗义，许多年少于他的业余作者都把他当作值得信赖的大哥。有位年轻作者一时气盛，与妻子闹到几乎要离婚。建平知情后，拉着小伙子促膝长谈一个通宵，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两人一夜抽完三包烟，熬得满眼血丝，最终换得小两口和好如初。那年得知中江七旬农民邓天有四年寒窗苦熬出一部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却苦于难以发表，建平闻讯找到老人，热心鼓励，想尽办法帮助联系出版社和筹集书款，最终促成这部作品正式出版。

细读建平兄文集《乡关回望》，全书没有顶天立地的大人物和动人心魄的大故事。敏锐的视觉观照的是生活低矮处的芸芸众生，细腻的笔触抒写的是对德阳这片热土的深深情愫。文中的人物，无论是远道而来投身三线建设的移民，还是世代在穿城堰傍水而居的本土街邻，抑或是川剧团小编剧、三大厂青工、钟鼓楼守更人、走街串巷的收荒匠，种种角色，无不透着善良质朴的美丽光泽，令人读来心中泛起无尽的温软。

三年前德阳市作协换届，德高望重的建平兄被推选为主席。上任伊始，最大的难处是缺少活动经费。他没有简单向上级伸手和八方化缘，而是与同仁精心策划，以服务社会、互助共赢为原则，制订详尽文案，亲自出马，与一些企业单位洽谈合作。凭借不卑不亢的文人优雅和颇具打动力的合作条款，有效配对联姻，为协会引入了资金活水源。

去年暮春，因疫情影响，协会久未开展活动。建平当时已被确诊为白血病，十分虚弱。为了防止人心涣散，振作队伍士气，他不愿医生和家人劝阻，带病召集会议，会上，他与往常一样言辞铿锵，阐释工作思路，部署工作重点。细心的与会者却分明看见，巨大的汗珠从他的口罩下成串滚落。

今年春节前后，建平病情一度好转，脸上容光焕发。我们都以为奇迹出现，奔走相告为他高兴。建平兄也将病厄置之度外，朋友聚会谈笑风生，偶尔还呷两杯酒，摸几圈麻将。回到家里，他像一条曾经搁浅的鱼儿重回温暖的港湾，细细品味天伦之乐。他陪着心爱的孙女弹钢琴，轻声唱和；他把小孙子架上自己脖颈，甘作驯驯的马驹；他与儿子出门散步，父子俩搂肩搭背，情同兄弟；他与爱妻相拥留影，妻子伸手揪他的耳朵，他冲着镜头扮出精灵怪模样。蛰伏于心的文学梦想也复苏过来，打开电脑，一部中篇小说款款开章；几则清雅的短章陆续见诸报端。

谁曾想，阳春三月，建平兄病情突然恶化，短短数日，即瀕垂危。生命倒数前两日，他在朋友圈看到同龄友夫妻在名山大川旅游甜美如度蜜月，不禁喟然叹息，握住妻子的手说：“对不起，此生再也无法伴你游走天下，亏欠你了……”

建平兄走了，离开在春风和煦的日子；那一脉暖人的温情，却不绝如缕，汨汨流淌在我们心中。

## 致战友

□韩玉龙

是你，洒下寒冬里一缕阳光  
是你，栽下春天翠绿的希望  
是你，撑起炎炎夏日的阴凉  
是你，带来金秋的瓜果飘香

因为有你  
山野乡村变了模样  
因为有你  
群众的幸福挂满脸庞  
因为有你  
贫困家庭迎来了致富的希望  
因为有你  
诠释了不忘初心的担当

亲爱的战友，不畏艰险，斗志昂扬  
亲爱的战友，不畏艰难，敢干敢闯

面对高山，我们攀登向上  
面对风雪，我们迎面赶上  
真扶贫，扶真贫  
让真情关爱在山水间传递荡漾  
让希望的羽翼展翅翱翔  
让这颗初心永远镌刻在祖国的大地上

## 长大后我就成了您

□余晓莉

当了30多年的孩子王，送走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我已记不清教过多少学生，但我永远忘不了教过我的老师。从小学到中专，再到参加工作后进修的老师，我都能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

记得上初中二年级时，我的班主任是王毅老师。他当时参加工作没几年，留着学生头，说话轻言细语，清瘦的脸庞非常随和。他在教我们的几年时间里，从没批评过任何一个同学。

他本来是教物理的，但爱好体育，就在班上组建了一支女子篮球队。我是其中一员，利用放学时间训练。训练那天，我穿了一双很不合脚的大头皮鞋，是哥哥穿过的。在篮球场上跑起来，鞋子会发出很大的声响。

王老师不时回头看我的鞋，什么也没说。除我外，其他同学还有穿大棉鞋、胶鞋的，甚至还有穿麻窝子草鞋的，就是没有穿运动鞋的。不久，篮球队被解散了。长大后，我才明白，王老师是在呵护我们小小的自尊。

初中最后一学期，换了一个班主任，姓胡，整天笑眯眯的。看到其他班的同学春游，我们也要求春游。胡老师没有直接说行还是不行，只是对我们说，马上就要中考了，时间对你们很紧迫，好好学习，将来出息了，祖国大好河山随你们去游。如果实在想游，学校后面的水库有一条小船，划着小船拍照片，写上“西湖留影”字样，谁敢说不是西湖？

中考结束了，我们班有五人考上师范学校，一人考上航校，两人考上省属中专。对上世纪80年代偏远的农村中心校来说，这个升学率简直是一件惊动四乡八邻的大喜事。

我上了师范学校，看到课程表上有一门说话课，心想，谁不会说话？居然还要学说话？上课了，走进教室的是张老师，她有一头乌黑的齐耳短发，那时叫“幸子头”，一双黑亮的大眼睛，还有一张甜甜的笑脸。一节课下来，大家都喜欢上了说话课。

二年级时，也许是青春期的叛逆，我突然不想上学了。说话课考试，我呆呆地坐在座位上，等其他同学都走完了，我才磨蹭着来到张老师面前，小声说，张老师，我想退学……还没说完，我就大哭起来。张老师既没有劝阻我，也没有追问为什么，只是静静地等我不哭了，就说说说话课考试结束了。

哭了一场，我猜想考试肯定不及格。但当我拿到成绩通知书一看，说话课成绩居然是98分。那一刻，退学的念头飞到了九霄云外。后来，张老师告诉我，你平时上课表现不错，给你高分是应得的。读书不易，好好学习吧。那一刻，我泪流满面。心里暗暗想，长大后，我一定要成为您！

如今，我已在讲台上站了30多年，每每想起教过我的老师，我真想说一声“谢谢老师”，长大后我成了您。我的学生也有的成了您，将来，还会有无数人成为您。

## 母亲弄“丢”了五元钱

□陈振林

那天晚饭后，我们姐弟4个心儿“怦怦”地跳着，围在母亲身边，等着她和我们说话。

我们四姐弟，心里有着各自的打算——这是1981年的夏天。那时，大姐16岁了，她对母亲偷偷地说，想要买两支发卡，有蝴蝶结的那种。二姐小大姐两岁，她想要买一个书包，她已经初中二年级了，还没有书包。我呢，当时10岁，读小学四年级，想着向母亲要点钱买小书摊上那本《三英战吕布》连环画。小弟弟只有6岁，成天喊着要吃糖，想吃那种有大白兔糖纸的糖。

母亲站起身，从我们面前走过，用左手帮两个姐姐理了理额前的头发，用右手轻轻地摸了摸我和弟弟的脸，低声地说：“我好像弄丢了5元钱……”她说着，坐了下来，像丢了魂儿一样。

我们一惊，5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父亲在小学代课，每个月也就22元钱，家里只有这点收入。父亲和母亲曾商量，家庭开支每个星期安排5元钱，每月剩下两元处理人情往来这些杂事。

家里加上爷爷、奶奶，一共8口人，每个月20元的开支是很紧的。好在母亲能干，将家里家外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们一家人吃得饱、穿得暖。以前，母亲也曾说少了一元钱或者两元钱，但挺一挺就过去了。可是，母亲这次一下子就弄丢了5元钱，这个月剩下的一个星期怎么过啊？

“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放在哪儿了？仔细去找找看。”父亲说。

我们姐弟4人听父亲这么说，立即跟着母亲从厨房跑到屋里的两个房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开始寻找。可是，我们寻找的结果，除了找到我那本破烂的《鸡毛信》连环画，再就是找到了弟弟的3张大白兔糖纸。

弟弟很开心，我们却不开心，因为，我们那美好的计划就要泡汤了。大姐叹气，说她的蝴蝶结发卡是没希望了。二姐还好，说反正之前也没有书包，也习惯了。我有些不甘心，那本《三英战吕布》连环画要是不买来，可能就会被隔壁班的同学建新买走了呢。

父亲知道了我们寻找的结果，从来没有责怪母亲的他发出声音了：“你看，你一下子弄丢5元钱，这一大家人怎样生活？难道一起喝西北风去？”母亲不出声，她知道做错了事。我在心里也埋怨着母亲，太不细心了，比我还粗心大意，但我不敢说出来的。两个姐姐自然也不敢说出声，从她们的表情看，也对母亲有着极大的不满。小弟吃不到糖果，哭一声就过去了，倒像没事儿一样。

可是，日子还得向前走。父亲和母亲一起调整了下一周的开支计划。我记得，那一周里，我们姐弟4人没有吃过早餐，街头油饼的香味在我们身边弥漫，我们只能闻闻。父亲那周没碰过一次酒杯，酒瓶空着哩。爷爷呢，居然在那几天一支烟也没有抽。一周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我们姐弟渐渐长大，屋子得翻新了。1984年，村里的旧学校变卖砖瓦，那砖瓦，我们的屋子翻新正可以用得上，还节约了成本。父亲和爷爷想着法子筹钱。

很意外，母亲拿出一个黑色小布袋，小布袋里全是钱，最大的票面是一元的，也不过几张，更多的是一角两角的纸币，再就是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我们姐弟4人围了过来，清点了一下，居然有328.56元。

我们一惊：原来，母亲找到弄“丢”的钱了。

30多年后，我们姐弟都有了各自的房子，有了子女。大姐的儿子在上海想要买房，二姐的女儿想着要出国，我的女儿想着到广州发展，弟弟的儿子想着要到省城读大学。我们四姐弟一谈到这些现实的话题，就开始发愁了。

于是，我们会想起弄“丢”了5元钱的母亲，想起她拿出的那个黑色小布袋。